

第四章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开放大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快速推进，各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在一起，促进了世界发展繁荣和人民福祉改善。然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总是相伴相生。近年来由于各国发展失衡，尤其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逆全球化抬头，促使更多人反思全球化利弊。但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当前的“逆流”符合“螺旋式发展”规律，随着新一轮规则整合与技术革命，全球化将在曲折中开启新征程。

一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一）15 世纪之前，丝绸之路与经济全球化的早期探索 1.0 版

经济全球化是工业革命后出现的一个概念，但在很早之前，人类就开始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古代丝绸之路，它可以說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雏形。古丝绸之路第一次繁荣期出现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后，丝路贸易在中国、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当时，即使要穿沙漠、骑骆驼，依然挡不住世界各国的交往步伐，欧亚贸易大动脉就此打通。第二次繁荣期出现在唐朝，商路再度繁荣，商品范围也更加拓展。随着阿拉伯帝国崛起和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日见兴盛。到宋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西北丝路。同时，在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无论是早期的斯基泰人，还是后来的匈奴人、粟特人、突厥人、蒙古人，几千年来都

在推动草原丝路的绵延和发展。

（二）15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市场的形成2.0版

欧洲各国陆续开始工业革命加上航海技术发展，推动了人们开始远航，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伴随着殖民扩张，人类活动开始遍及五大洲、七大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民还不用护照，有3000多万人移民美国，1200万人到加拿大、阿根廷，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化高潮，统一的世界大市场开始逐步形成。这一阶段的国际贸易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大规模的现代生产出现，急需原材料供给和世界市场。在利润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寻求资源和拓展市场，促进了世界各国联系，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为日后的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三）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生产和贸易全球化加速3.0版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支柱，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开始从自发走向制度化，生产和贸易全球化加速，技术和产业转移加快，出现了全球化的第二次高峰。战后国际秩序的恢复和国际组织的建立，为各国提供了相对和平宽松的环境，跨国公司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跨国公司发展的黄金时代，仅1968—1969年全球新建跨国公司7200多家，国外子公司27300多家。这一时期，国际贸易迅猛发展，1991年世界贸易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60倍（见图4.1）。同时，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紧密合作。世界出现了两个平行市场。

（四）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4.0版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迎来大发展。原苏东国家实行经济转轨，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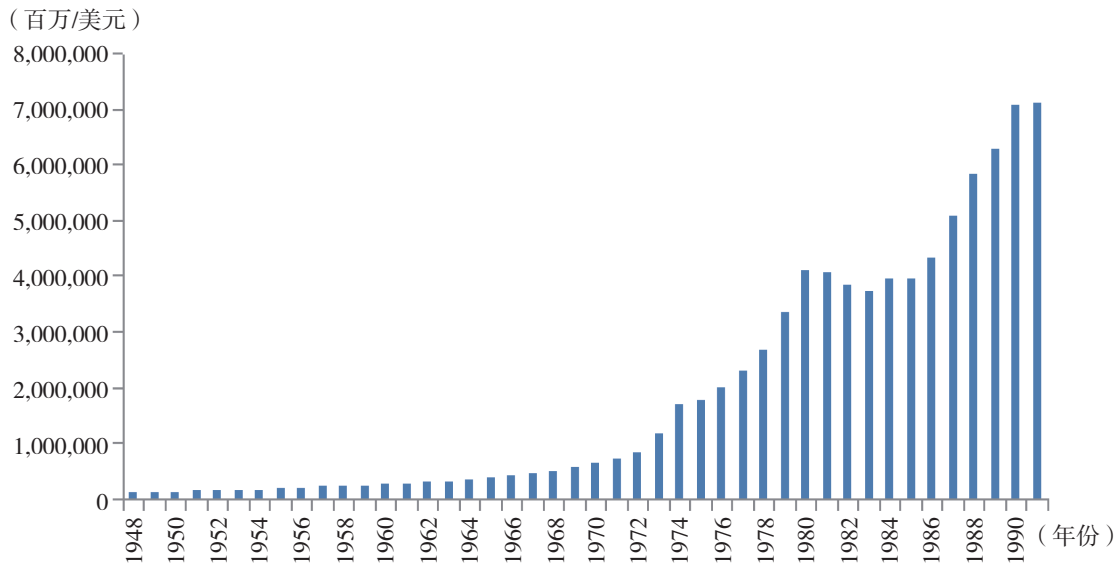


图4.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贸易额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特别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信息、资本和商品在全球流动加快，地球上空间距离“缩短”了，通信信息的“时间差”消失了，这种局面加快了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世界变得空前开放。世界各国原有的“一国经济”跨越国界走向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推动贸易、资本、生产、消费、技术、服务、组织等全方位的全球化，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从而形成全球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经济格局。这一时期（1990—2019年），世界贸易总量增长5.4倍，世界投资存量增长15.3倍，世界航空客运量增长4.5倍。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世界市场，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01—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4%提升到13.1%，吸引外资流量比重从6.1%提升到15%，对外投资流量比重从1%提升至18%，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的重要力量。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2020年世界贸易总量下降5.3%，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42%，全球航空客运量锐减67%。IMF、WTO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6.0%，全球贸易增长8%。

专栏4-1 波音与苹果的生产全球化网络

全球化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波音飞机和苹果手机，其制造流程就是生产全球化。787客机将产业链全球化做到了极致，在727项目中，外国供应商的工作量只占2%；到777项目，这一数据升至30%；而到787项目，达到了惊人的70%。在一架飞机的总价值中，机身、机翼、尾翼、起落架的占比约为40%。在787客机中，有几百万个零部件，意大利的阿莱特尼和美国的沃特飞机工业公司负责机身的中心部分，机翼、尾翼的大部分由三井、三菱、川崎三家日本重工业财团垄断。而波音自己只负责建造飞机约35%的部分以及最后的总装。对此，波音CEO康迪特有句经典描述：“我们就是一个装配公司，或者叫设备集成商。”苹果手机的全球供应商有766家，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供应商69家，中国供应商346家，日本供应商126家。

瑞士经济学会的研究报告印证了这一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全球化指数快速上升，从1990年的43.3上升到2018年的61.8，开放度增长接近1.5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开放程度有所趋缓，但仍保持一定的增长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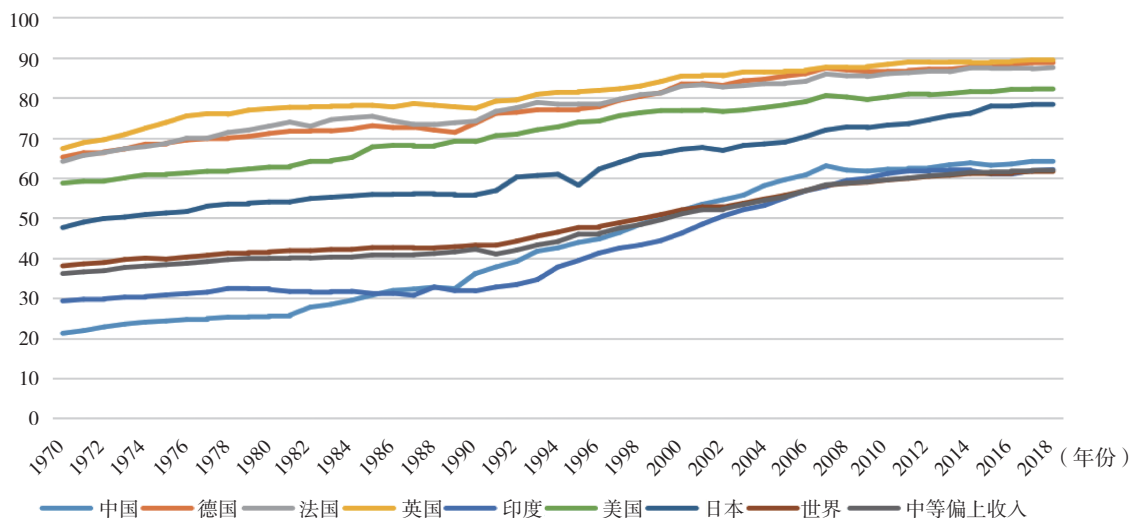


图4.2 全球化指数

资料来源：KOF瑞士经济学会。

度，平均维持在60左右的中高水平；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开始快速融入世界，中国全球化指数从36.3增加到64.3，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印度全球化指数从31.9增加到62.2，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指数低了20—30个百分点。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各国开放互相促进，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越开放，而各国政策越开放，越能促进全球化深入发展。

二 经济全球化的阻力增大

“其进弥骤，其途弥险”，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动力与阻力同步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家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将自身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蓄势、再出发的新阶段。

（一）保护主义思潮抬头

经济全球化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的问题凸显，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贫富差距过大，世界基尼系数高达0.7左右，全球化的“受损者”日益不满，掀起一股全球性的保护主义思潮。近年来，先后出现英国脱欧、中美经贸摩擦等重大事件，一些国家极右或极左政党崛起，对内强调本国利益至上，对外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反对经济全球化。据WTO 2021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G20经济体采取的140项和贸易相关的措施中，其中39项（28%）为贸易限制性措施。

专栏4-2 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

历史上民粹主义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波由1870年俄国民粹派运动和1892年美国人民党运动构成，都维护农民阶级利益，反对资本主义的主

张。第二波是20世纪30—60年代的拉美民粹主义运动，推行一系列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庇隆主义在拉美国家影响深远，歌唱庇隆夫人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植根人心。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亚太国家和地区政治转型过程中，产生声势浩大的草根运动，这些运动带有强烈的反独裁、反威权、反权贵精英的趋向，矛头指向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

（二）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考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风险，很多国家都试图重振制造业，美国提出了“制造业回流”，在税收、外贸、投资等政策方面向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各国开始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德国汽车工业转型为例，从传统的大批量生产转变为基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个性设计与定制生产，使制造业回流更具可行性。研究发现，经过之前的高速成长，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已经接近“天花板”。根据WTO等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2007—2017年，全球价值链平均参与度总体下降了4个百分点。全球价值链呈现出阶段性收缩、“去中心化”及“本地化生产”等趋势。

专栏4-3 全球价值链发展新趋势

根据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测算，2011—2015年，单纯由本国生产本国消费的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增加了近15万亿美元，而有两国以上参与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下降了0.3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中间品的离岸生产活动占整个生产活动的比重可能将从当前的9.4%下降到8.8%。

（三）国际规则重构博弈加剧

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是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兴市场话语权和影响

力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明显分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济及贸易的世界占比，都比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20个百分点左右，对外投资占比提高了18个百分点。发达国家要求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大国际责任，致力于通过规则来维护和强化竞争优势，从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不愿被动承受超过自身发展阶段和竞争力水平的“国际责任”和“约束条件”。同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升，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这些需要持续努力。同时在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数字经济、新兴服务业领域乃至生态、文化等“泛经贸”新兴领域，各国诉求更加多元。

专栏4-4 美欧碳边境税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挑战。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基本原则。各国以“自主贡献”形式积极推动碳达峰、碳减排、碳中和。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快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2021年7月，欧盟委员会推出“碳边境税”征收计划，拟对进口的钢、水泥、化肥以及铝等碳密集型产品征税，以此保护欧盟企业不会因采用更高环保标准而处于竞争劣势。

（四）国际治理“赤字”备受关注

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全球问题增多，解决方案不足；全球规则增多，国际协同不足；全球市场扩展，规制监管不足。2016年以来，一些大国内顾倾向明显，在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明显分化，采取“更具选择性、更为务实的态度”。在多边贸易体制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多哈谈判举步维艰，上诉机构甄选程序被阻挠，争端解决机制（DSB）陷入瘫痪，多边主义权威性受到削弱。国际投资领域缺乏类似的多边机构和统一的标准和规则。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及相关制裁措施加剧，增加了政府监管和企业经营成本。在国际金融、数

字经济、互联网等各领域，新商业模式不断出现，规则体系建设也显著滞后商业界现实需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然硬实力有所上升，但软实力仍然匮乏，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仍有待提高。

三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犹存

从历史长镜头看，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通常被认为是由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的国际交易成本下降，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结果。中国对外开放，柏林墙倒塌，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转轨，欧盟一体化，全球价值链体系深入发展，“地球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现实。时至今日，这一驱动力并未发生扭转，谁也承受不了倒退回去的代价。

（一）市场因素：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市场扩大→分工深化→规模经济→效率提升→经济增长是客观规律。本质上，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市场等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都对国际生产模式产生一定冲击，但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全球布局是更合理、更高效的选择，只要这种生产方式和统一的世界大市场没有根本性变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动力就一直存在。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生产经过短暂下降后迅速恢复，虽然增长速度不如危机前快，但稳步扩张。人类经历过前所未有的融合，享受过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后，再退回到之前的“孤岛”状态，是开历史“倒车”，不符合人类根本利益。

（二）技术因素：科技进步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一般来说，科技革命大发展、市场分工大拓展，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全球化加速向前。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

温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基于三项“运输”成本先后减少而引致的经济现象，首先是货物运输的成本下降，导致生产集中，形成若干区域制造板块；其次是信息传播的成本减少，跨国通信成本大减，令生产模式再出现变革，形成全球供应链；最后就是人员流动的成本下降，未来将导致世界进一步扁平化。新能源、新医药、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3D打印、区块链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相继产业化，将带动大量新的市场需求。在全球5G网络支撑下，一些小型公司、初创企业乃至个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门槛大大降低。数以亿计的人口参与跨境电商，越来越多的人口跨境交流，世界互联互通以及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会进一步改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专栏4-5 科技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

美国积极推动科技发展以及关键产业的研发与保护，力图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半导体、生物技术、航天等领域保持竞争优势。欧盟加大绿色经济上的投资力度，以保持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把信息技术、环保、电力汽车、医疗、太阳能等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都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加快推进以绿色和低碳技术为标志的能源革命。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工业发展方向。信息网络产业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全球互联网正在向下一代升级，传感网和物联网方兴未艾。在这些领域中，突破关键技术并使之产业化，将会促进产业振兴，导致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国际分工、全球市场扩张，使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难以分离，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

（三）制度因素：全球市场体系及国际规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冷战结束后各国相继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前，虽然多边贸易体制举步维艰，但随着全球经济大变革、大调整、

大重构，国际规则加速演变，各国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还在深化。2021年7月，G20同意推进全球税制改革，以便为跨国企业设定全球最低税率，有利于全球配置资源。同时，区域一体化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通过签订自贸协定促进区域内开放与合作，这是多边体制的重要补充，是一种迂回的多边治理进程。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加强内部成员联合，既享受区域内市场开放的好处，又可以以此为依托，制定更高水平开放标准，在规则施行成熟之后上升到全球层面，成为世界通用规则，为更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四）安全因素：开放安全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内在需求

耗散结构理论表明，开放系统可以不断与外部交换物质和能量，走向有序；封闭系统则熵值不断增加，走向无序和衰亡。经济系统亦是如此。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紧紧绑在一起，大家利益交织、风险与共，爆发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降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的金融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局限在一国的边界内，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安全也成为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需要全球加强合作与共同应对。同时，气候问题、疫情流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合作、需要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在开放中谋求自身安全，扩大共同安全，成为各国的现实选择。东亚经验表明，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越开放越能扩大发展空间，“在大海中学会游泳”，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四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最新动向

全球化时代，“环球同此凉热”，新冠肺炎疫情更容易扩散。但疫情并不会是世界互联的终结，与其说它改变了全球化基本方向，不如说加速了全球化调整，而调整是为了走得更远。

（一）疫情引发了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

疫情的巨大冲击，使世界经济陷入严重收缩，其程度在过去100多年里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大萧条。据统计，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4.3%，超过85%的经济体的GDP都在下降。疫情改变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化风险，重新审视产业安全。一些国家以保障“供应链安全”为名，打造“自给自足”或多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2020年，日本政府实施“促进国内供应链投资”和“支持海外供应链多元化”项目，支持医疗、汽车、机电等企业新增本土投资或向东南亚分散。2021年，美国政府启动对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电池、稀土矿物和药品四种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审查，推动关键产品在国内的生产，并与亚太国家合作，促进关键产品供应链多样化。跨国资本也重新权衡安全与效率，宁愿牺牲部分利润也要缩短供应链环节，规避风险。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防备主义”在疫情后将有所抬头，生产更加地方化，全球价值链将会变得更短；“去全球化”可能言过其实，更可能是出现局部脱钩，尤其是医疗行业。

（二）疫情凸显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紧迫性

疫情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危机，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恐慌，甚至在很多地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疫情凸显国际治理缺陷，可能成为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给世界秩序带来新的挑战。国际合作合力减弱、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这些特征在疫情前就已存在，疫情后更加凸显。国际社会应对疫情合作不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短板。疫情引发的次生灾害，如经济衰退、社会停摆、权力扩张甚至国际摩擦，进一步暴露出全球治理的功能性失调。基辛格认为，人类站在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节点，疫情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要为秩序过渡做好准备，开启未来世界秩序。事实上，疫情后国际治理走向良性还是恶性，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特别是中美等大国的选择，要防止“脱钩论”“新冷战论”“修昔底德陷阱”等预言自我实现。

疫情后数字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契机。疫情限制了人与人的直接交往，改变了贸易活动、生产生活方式，凸显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疫

情期间，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无线支付等新业态迅猛发展。2020年，全球排名前70的互联网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58.9%，增速超过前几年。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贸易成为全球化的新载体，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治理体系成为全球化转型的新机遇，数字税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焦点。经合组织（OECD）积极推动建立数字税多边框架，法国、意大利、印度、墨西哥等国通过立法开征数字服务税，部分国家不赞成单边开征新税。数字税是针对数字时代的税制改革和税权的重新划分，事关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改革和重塑。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认为，数字化经济需要增强全球的贸易关系，加强规则标准化，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三）疫情难以阻挡经济全球化曲折向前的大势

从历史长周期看，“逆全球化是必要插曲，全球化是世界大势”，全球化代表人类进步的历史洪流，即使短期内有曲折、有倒退，但向前发展的大方向不会根本改变，全球化经过一轮治理调整、规则修正，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美国兰德公司专家科恩认为，全球化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反恐战争，以及多次病毒大流行、多次逆全球化浪潮的考验，已颇具韧性和抗压能力，当前疫情绝不会是“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会宣告全球化终结。辩证地看，疫情短期内会阻碍全球化，长期看会反过来推动各国政策调整，促进全球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历史雄辩地证明，全球化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瘟疫、战争、危机、国际格局变化都会阻挠甚至打断其发展，经济全球化在一定时期内可能经历低谷，会“短路”、会曲折，但最终还是向前，如同江河弯曲奔向大海。

全球化与世界开放是一体两面，推动全球化持续向前、推动世界扩大开放是破解当今世界发展难题的不二法门。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同一个时空里，各国都应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一切犹豫者、观望者只会丧失机遇、失去自己；一切奋进者必将发展自己、造福世界。